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 第二辑

近代广州 城市文学与文化资源

何大进 主编



广州市人文历史重点研究基地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 第二辑

近代广州 城市文学与文化资源

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代广州城市文学与文化资源 / 何大进主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11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 2)
ISBN 978-7-80696-567-2

I. 近… II. 何… III. 文化史—广州市—近代—文集
IV. K296. 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7233号

近代广州城市文学与文化资源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 2)

何大进/主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50000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567-2

定价: 125.00元 (全二册)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编委会

顾问	李明华	郭凡			
主编	何大进				
编委	邱捷	张人杰	康保成	刘晓明	
	赵春晨	肖星	吴小强	冷东	
	纪德君				

序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珠江水系东、西、北三江交汇处，内可与长江和黄河流域等中国腹地连为一体，外可经南海达东、西两洋，通往世界。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广州自古至今不仅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且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秦汉时期，广州（史称番禺）已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及至隋唐，广州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大港。港内舟楫交击，百舸争流，蔚为大观，不仅世界各国商贾云集于此，各地宗教亦在此传播。在明清之际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采取“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政策，而广州不仅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它不断吸纳和消化各种异质文化，使之在这块土地上兼融、共生与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将西方文化传递到中国内地，使其逐渐融汇于中华文化之中。至19世纪中叶，广州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又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黄花岗起义，国民革命、广州起义……几乎中国近现代每一段历史都深深地烙上了广州的印记；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许多革命先驱和文化名人都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踪迹。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涌起时，广州又以其特殊的区位优势 and 兼容并蓄的人文环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

创造了世界为之惊叹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广州城市文化。

在漫长的岁月积淀与历史传承中，广州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风格鲜明、多姿多彩的人文遗迹和历史景观，留下许多意蕴深长、可歌可泣的民间故事与英雄史诗，而且形成了一种多元、兼容、开放、务实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探讨广州历史渊源、追忆广州前尘往事，发掘广州文化内涵，从而缅怀前人，激励来者，无疑成为广州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鉴于此，广州市委宣传部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重点突出的要求，于2006年初批准成立了广州市人文历史重点研究基地，以期通过基地建设“扶持有广州地方特色的研究，推出有广州特色的研究成果”。

广州市人文历史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以来，以广州大学为依托，以一批年富力强并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为骨干，结合广州和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围绕广州社会与城市文化的流变、内涵、特点和发展规律等相关领域，展开了深入的学术考察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基地将以系列丛书或论丛的形式，陆续推出相关的研究成果，为繁荣广州和岭南地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广州的文化品味，做出应有的贡献。

何大进

2007年6月于广州

目录

- 1 · 晚清稀见通俗小说《煲老鸭》的发现与研究 刘晓明
- 14 · 浅论卢循在广州的军事活动及其军事思想 宋其蕤
- 29 · 陈洵和他的《海绡说词》 曾大兴
- 42 · 黄世仲近事小说中的广府风情 纪德君 梁冬丽
- 61 · 丘逢甲诗中的广州人文景观 方志钦
- 76 · 《谏果回甘》中的岭南社会初探 凌彦
- 86 · 《海山仙馆丛书》研究 倪俊明
- 116 · 从《海国四说》看梁廷相对西方社会的认识 郭金凤
- 122 · 地方风物传说的审美价值
——陈一峰的《新编扭计师爷陈梦吉故事大全》 刘介民
- 132 · 试析广州传媒中的各种语误现象 罗维明
- 147 · 外国侨民与广州近代报刊的肇端 何大进
- 159 · 广府精神文化影响下的广州社会用语特色 戴仲平
- 170 · 粤语避讳语与广府文化 陈森星 戴仲平
- 176 · 试论广州芳村地名 黄小娅 唐晓阳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

- 207 · 试论新时期岭南都市文学的后现代特征 叶从容
- 218 · 广州出土战国秦汉文字辑证举隅 李煜
- 227 · 说“飞檐” 汪叔子
- 233 · 汉代南越国“好事鬼”风俗考 吴小强
- 240 · 南粤麒麟舞的特点与革新 刘介民
- 252 · 浅谈八和会馆在粤剧发展中的作用 陈泽然
- 263 · 清代广州社会生活之茶楼文化 庞洁冷东
- 273 · 论广州陈家祠旗杆的文化价值 费省
- 283 ·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人类学思考
——以广州陈家祠为例 何向 吴水田
- 293 · 广州陈氏书院门面装饰与民间习俗 梁正君
- 311 · 广州陈家祠建筑的文化性 王发志
- 319 · 穗澳两地优秀西洋近代建筑的旅游价值与开发意义 肖星
- 333 · 穗港澳商都旅游文化特色及发展探微 胡幸福
- 345 · 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对名山的保护 吴建新
- 355 · 广州五仙观旅游开发探讨 陈文君
- 365 · 略论广州会展业的发展 刘松萍
- 383 · 广州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优势剖析 何薇
- 393 · 试论广州道教旅游资源及其开发 王丽英
- 402 · 广州城市空间拓展研究 方中权

晚清稀见通俗小说《煲老鸭》的发现与研究

刘晓明

广东清末木刻本通俗小说《煲老鸭》是笔者在旧货铺偶然发现的，此小说是最早的以广州方言写成的通俗小说之一，广味十足，书前附有版画十幅，更重要的是，此小说未载于国内外相关书目，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收藏，弥足珍贵。《煲老鸭》一书对于了解晚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广州的民间出版、版画艺术，社会风尚，乃至文学地缘特征的形成，皆有重要价值。

一、《煲老鸭》的版式、著录与刊刻

《煲老鸭》一书为线装刻本，未著撰人，不分卷，长 16.5 公分，宽 11 公分。边栏单线，高 12.3 公分，宽 9.2 公分。天头 3 公分，地脚 1.2 公分。版心有单鱼尾，其上部题有书名《煲老鸭》，下部为页码。全书共三十四叶，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全书含标点共计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字。所用纸张为常见的毛边纸。

《煲老鸭》一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考诸家小说书目，均未见著录。如周越然《稀见小说五十种》^①、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②、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③、《中国通俗小说书目》^④、顾燮光《小说经眼录》^⑤、阿英《晚清戏曲小说书目》^⑥、胡

广州人文历史论丛

仕莹《清人编刊的拟话本集叙录》^⑦、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⑧、《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⑨、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⑩、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⑪、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⑫、《日本日光轮王寺所藏中国小说》^⑬、戴不凡《小说闻见录》^⑭、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⑮、江苏省社科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⑯、张纯《晚清稀见小说经眼录》^⑰、刘镇伟等《大谷本明清小说叙录》^⑱等书目，以及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⑲等，均未载入《煲老鸭》一书，堪称传世孤本。

此外，广东地方文献及各图书馆也未见著录与收藏。如著录广东地方文献 6000 余种的黄荫普编《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⑳、陈德芸的《广东未刻之书籍》^㉑、今人骆伟主编的《广东文献综录》^㉒，以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小说史目录》^㉓、首都图书馆藏《中国小说书目稿》（五四以前部分）^㉔、民国《广东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㉕、《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广东文献参考书目录》^㉖等均未收藏。

不过，最近出版的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了《煲老鸭》一书，题“新刻，一卷一册，作者佚名，五桂堂，中央 39，B0272”^㉗。“中央”即台湾“中央”研究院，2005 年 12 月，笔者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包括傅斯年图书馆访查此书，结果发现，此书虽然著录，但却早已佚失，也即现“中央”研究院并没有收藏此书。对此，樽本照雄未予著明，其说明的范围也未超出图书馆的著录，说明他只是根据著录进行采撷，并没有目验过此书。

《煲老鸭》的刊刻者为五桂堂，此堂创办于清道光中叶，堂址原在广州西关第七甫，据《南海县志》载，第七甫在当时广州西城太平门外街，所在地即旧志的仙桂坊。五桂堂的创办者是花县徐成源、徐成学昆仲。五桂堂是广州近代著名的出版机构，以刊印通俗文艺作品为己任，其民国年间刊印的《再生缘摘锦》上卷终有一行

商家的说明：“本堂向来聘请著作编辑名师校订各种南音、龙舟、大小曲本、新奇小说、通胜日历。”五桂堂眼光独到，名闻遐迩，其所刊印的木鱼书、小说、南音、龙舟歌、曲本数量大、种类多，如清末民初曾刊行《南音》一百三十六种，一千零三卷，《龙舟歌》四十五种八十五卷，这些作品皆为当时的草根文学，与学海堂刊刻的《皇清经解》、菊坡精舍的《通志堂经解》、广雅书局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精英文化遥相呼应，为保存及光大民间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煲老鸭》在广东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清代五桂堂出版的通俗小说极少，只有五桂堂咸丰七年刊刻的《绣像二度梅》，以及《煲老鸭》、《梁三颠》、《阿斗官》、《半日阎王全传》等数部，而《煲老鸭》则是晚清由广州五桂堂刊刻的稀见的以方言写作的通俗小说。民国间，广州五桂堂“书局”还出版过《俗话爽心》四卷广东方言小说，此外，四五十年代香港五桂堂曾刊刻过一百四十余种传统通俗小说，但未重印《煲老鸭》^⑧。在清末及民国年间，广东刊刻粤籍作家所著的传世通俗小说不过三十余种，加上外地出版的由粤籍作家所著的通俗小说约六十余种，《煲老鸭》的发现为之增添了新的史料。即便在整个晚清文学史中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较为稀见的以广东白话写成的一部晚清通俗小说，此类小说除《煲老鸭》外，只有咸丰辛亥（1851年）广州富桂堂出版的《大明全传绣球缘》、广州五经堂同治九年出版的邵彬儒《俗话倾谈》、《俗话爽心》，以及《中外小说林》旬刊刊登的少数方言短篇等。此外，有些小说虽不是用方言但却使用广东的俗语刻写而成，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广州富经堂出版的《瓦岗寨演义传》、咸丰年间广州蝴蝶楼版的《绣鞋记警贵新书》等。在晚清小说中，《蜃楼志》、《桃花女阴阳斗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近社会齷齪史》、《瞎骗奇闻》、《九命奇冤》等虽为粤籍作家所著，却不是用广东白话写成。

二、《煲老鸭》的成书时代与作者考

1. 《煲老鸭》成书时代考

《煲老鸭》一书未著明刊刻时间，但从版式、插图以及行文背景看，当是五桂堂晚清所刻。首先，从题署看，《煲老鸭》应刊刻于晚清。根据五桂堂的封面题署，《煲老鸭》是五桂堂早期所刻之书。笔者根据自藏以及目验了广州、香港、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的五桂堂出版的通俗文学，发现其题署具有如下时间特征：第一，题署“五桂堂”、“粤东省城第七甫”出版的木刻线装书基本上都出版于清代，此时的五桂堂自称“书坊”，民国后则称“书局”。如五桂堂最早刊刻的木鱼书《掐碎灵芝》，封面署“五桂堂”，全书最后署“版藏粤东省城第七甫五桂堂书坊铺发行，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新刻清唱《掐碎灵芝记》全完尾终”。五桂堂出版的木鱼书《再生缘》封面署“粤东省城”、“五桂堂版”，木鱼书《后代卧龙太子走国》封面上方题“五桂堂”，书名后署“粤东广州市第七甫门牌二号”，这是现存五桂堂唯一署门牌号的出版物。不仅五桂堂板当时出版的图书署“粤东省城”，其它书铺出版物也是如此，如以文堂出版的木鱼书《三合明珠》即署“粤东省城状元坊内太平新街”。广州之所以被称作“粤东”，是因为两广在当时为统一之“粤”，从两广的区域看，广州自然属于“粤东”。历史上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只担任了半年总督（1911. 4. 14—11. 8），辛亥革命后便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由于文化相对于政治变革来说，往往具有滞后性，“粤东省城”的说法在民国初年的出版物依然有所保留，如民国初年的机器版木鱼书《改良正字第八才子花笺》仍署“粤东省城第七甫闸口开张”。称“闸口”

者又见五桂堂刻唱本《十谏嫖客》，署“第七甫闸口”。第二，题署“第七甫五桂堂”或“省城五桂堂”者在清末民初，如同治七年前五桂堂刻本通俗小说《半日阎王全传》封面署“第七甫五桂堂藏板”，卷尾题“省城五桂堂梓”。南音《阴阳雪恨》、木鱼书《五集钟无艳娘娘全本》皆署“第七甫五桂堂藏板”，木鱼书《绣像全本梁山伯牡丹记》，署“省城第七甫五桂堂藏板”，《新选时兴笑绝气》署“省城五桂堂梓”。第三，题署“省港五桂堂”者则在民国以后，如《六姑回门》。因为民国四年，即1915年，五桂堂为拓展业务，在香港设立分店，称五桂分局，局址在荷里活道七十二号，这以后，五桂堂所刻之书，往往题“省港五桂堂”作为总署，其中若属于广州所出版者，则在正文中加署“广州第七甫”，如其所刻《李龙闹酒》，其正文第一页加题“第七甫五桂堂板”。又如木鱼书《盘龙宝扇》，该书封面“省港五桂堂”下另有两个小圆，圆内署“广州市第七甫”、“香港文武庙”，页内署“第七甫五桂堂机器板”。第四，题署“光复中路五桂堂”者则在1931年以后。五桂堂原址在广州西关第七甫，1931年扩建马路，拆墙改街道，第七甫便成为光复中路了，因此，一般来说，署“第七甫”者都是在此之前刊行的书，事实上，1931年后大多数五桂堂的出版物也改署光复路，如木鱼书《西番碧玉带》，其目录页即署“广州市光复中路五桂堂”。唱本《闺谏瑞兰》、《石女自叹》、《老举留人客》、但是，我们发现此后仍有署“第七甫”者，如木鱼书《仁贵徇东》封面题“广州市光复中路”，而正文第一页仍署“第七甫五桂堂机器板”，木鱼书《金叶菊》也是如此。

《煲老鸭》只署“五桂堂”，既未署“第七甫五桂堂”、“省港五桂堂”，也未署“光复中路”，这正是五桂堂早期出版物的特征，当时广州的出版机构还不多，竞争也不像后来那样激烈，因此，不必通过特意表明地址来作广告，以示正宗。英国博物馆收入了一本五桂堂刻的通俗小说《半日阎王全传》，此书只有十四页，据柳存仁

研究，此书系根据《古今小说》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改编而成^⑨。该书国内未见藏本，只有异名的《三国因》，时间皆晚于五桂堂本，有光绪戊子（1888）文西堂刊本及善成堂本。五桂堂本《半日阎王全传》是1868年7月23日即同治七年收入大英博物馆的，其出版时间则在此之前。此书正文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板心上方刻“半日阎罗传”，其版式与《煲老鸭》类似，二书出版的时间应当不相上下。

从版式看，也可看出《煲老鸭》属于清代所刻之书。五桂堂出版的通俗文学读物中，很少有标明刊刻时间的，除上面提到的《捣碎灵芝》外，我们还在题“省港五桂书局印行”的《正字玉葵宝扇》木鱼书的最后一页发现“光绪三十四年改良新刻《玉葵宝扇》全卷终”的字样，说明此书是以民国的封面加订在清代的旧书之上的，因为“省港五桂堂”是民国后才有的。仔细比较封面和正文，发现二者字体不同，大小也不相同，封面比正文略大一些。不仅封面与正文不同，而且正文与正文也有差异，《玉葵宝扇》共有四卷，目录与第一卷为同一版式，版心无鱼尾，天头上著名书名、卷数、页码，后三卷为同一版式，版心署书名，下有鱼尾，五桂堂的《玉葵宝扇》翻刻过多次，笔者自藏的一本封面则题署“省港五桂堂·广州第七甫香港文武庙”，卷终特意注明“请认第七甫五桂堂机器板字样”。因此，光绪版《玉葵宝扇》是以不同时期的书版拼凑在一起印制的。根据《捣碎灵芝》和《玉葵宝扇》后三卷的版式，我们发现《煲老鸭》与之有诸多的共同点：版心书名单鱼尾，若有卷数则刻于鱼尾之中，下为页码。此外，清末民初的五桂堂印刷的通俗文学，正文第一页右下角一般都有一条形长格，内中著名“第七甫五桂堂板”，但清代的版刻作品则无此种版式，如五桂堂咸丰七年刊刻的《绣像二度梅》、光绪版《生草药性备要》与《煲老鸭》皆是如此。《捣碎灵芝》正文第一页右下方有“省城第七甫五桂堂藏板”，但没有用长格将其框住。

从印刷方式看，至清末起，广东的出版业开始采用铅印，版刻印刷逐渐式微。据徐信符《广州版片纪略》载：“自光绪晚年，学校兴而书院废，铅印兴而雕刻微，于是版刻渐渐衰替。”^⑩徐氏1918年创办广雅印行所，主持刊印过《广雅丛书》、《学海堂丛书》等，他关于广州民国后版刻渐渐衰替的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广东民国而后并非没有采用版刻的书籍，如东莞陈子励所刻《聚德堂丛书》、番禺汪憬悟所刻《画人传》、《公孙龙子注》等，这些版刻书毕竟凤毛麟角。而五桂堂在广州的出版业中是较早采用机器印刷的，民国初年，由于业务的发展，五桂堂以三百两银子一部的价格从日本购进机器印刷机两部，这种印刷机可将刻板置于其上，用手工操作，转一转便可印出十页，方便快捷，号称机器版，是当时先进印刷的标志，所印之书都注明“机器版”。如民国初年的木鱼书《六姑回门》题“省港五桂堂重刊正字机印”，《改良正字第八才子花笺》则在封面特别强调“机器板与别不同”。其他出版机构也是如此，可见当时机印是很时髦的，如广州的华兴书局，其所出版的南音《金叶菊》，特意标明是“机版正字”，醉经堂出版的木鱼书《二弃梨花》也标明“机器印行”，《煲老鸭》显然是此之前由传统手工印制的刻本。

再次，从插图版画的角度看，《煲老鸭》也应刊刻于晚清。木刻版画全凭手工雕刻，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因此，当清末西方印刷技术及器械引入进来后，通俗小说的插图，就很少采用木刻版画了，因为通俗小说是面向普通大众的，不是绘画艺术品，必须是物美价廉的普通读物。而《煲老鸭》一书不仅附有版画插图，而且作为一部只有三十四页的小说，版画竟达十幅之多，可见其印制成本是较高的，这种雕本插图刊本是无法在价格和机器印制者同时竞争，因此，从流通的角度看，《煲老鸭》应在机器印刷技术引进之前刊刻的作品。据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载：“清代刻印的若干长短篇小说，也以图版附丽助兴。最值得注意的是《红楼

梦》一书，于1791年刊印的第一种印本即附有书中男女人物图象24幅以上。……清代末期，西方印刷技术及器械引入推广，逐渐取代雕版插图的传统艺术。”^⑧

最后，从行文的背景看，《煲老鸭》的写作年代应该在光绪九年即1883年之前。《煲老鸭》中有一段作者所发的议论：“一岁之中，九州十八省破尽多少地狱。”从清代行省的设置看，康熙之前，全国总共有十五个行省，康熙初，以十五省区划过大，分江南行省为江苏、安徽；陕西行省为陕西、甘肃；湖广行省为湖南、湖北，十五省由此增至十八省，这就是所谓“九州十八省”的由来。至光绪九年，平定新疆之乱后，增设新疆行省。光绪十三年，改台湾为省。1900年后，又于东北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于是，原来的“九州十八省”遂成“九州二十二省”^⑨。据此，《煲老鸭》的作者仍然采用九州十八省的说法，可见，其写作年代应该在光绪九年之前。

又如，《煲老鸭》虽述“明朝崇祯”朝事，但涉及的军制、官制也是清代之制，而非民国人之口吻。如文述：“时兰州有一个严公子，恃父官居协镇，遂放肆横行。”考所谓“协镇”，乃清代绿营兵制，当时驻防于省者设提督，驻防于道者，设总兵，即所谓“镇”，下设副将，即所谓“协镇”，清代小说《珍珠舶》卷四第四回回目曰“严协镇幕中赠美”，文中称严协镇“乃提督标下副协镇参将严公”。清代末年，改练“新军”，划全国为三十六镇，设镇、协、标、营等军制，已经不再有所谓“协镇”的说法。

《煲老鸭》文内还有“总理”一名：“其时土匪作乱，村中团练乡勇，众人公举何清做村中总理。”这里的“总理”乃事务总管之义，明清人习用。明《酌中志》卷十四：“（马）谦于嘉靖四十一年选入，历升内宫监总理。”^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一回：“这回那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认为，《煲老鸭》一书当成书于晚清同光年间。

2. 《煲老鸭》作者考

《煲老鸭》一书不题作者，但我们可以根据其思想倾向、表达习惯、情节结构、叙事方式等，对同时同地的小说进行对应性的考察，再作出某种程度的拟测。

《煲老鸭》产生于的晚清，当时广州共有重要二十余家出版通俗文艺作品的机构，同光宣时期共出版各类通俗小说近百部。根据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考察，《煲老鸭》与同治元年华玉堂出版的《俗语倾谈》最为相近。《俗语倾谈》的作者是广东四会人邵彬儒，著有《俗语倾谈》、《俗语倾谈》二集，以及《吉祥花》、文言小说诗文集《谏果回甘》等，《俗语倾谈》共四卷，十个短篇，《俗语倾谈》二集共二卷，收入七个短篇，全部用广州方言写成。这两部书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和《煲老鸭》如出一辙，那么，《煲老鸭》会不会也是邵彬儒的作品呢？先看以下比较：

从思想倾向看，二书皆以宣扬因果报应为主旨。《煲老鸭》的基本情节是，明朝崇祯时陕西省西安府永兴县蟠龙村的王春外出经商，在兰州开了一家绒线铺，因曾救一好汉，后来在兵荒马乱之际得此好汉相救，渡过一劫。为避战祸，王春盘掉生意赶回家乡。而其妻早已耐不住寂寞，勾搭上村中“总理”何清。王春回家时遇见儿时伙伴杨良，杨良因困向其借钱，王春慨然应允，却被村中无赖挑生狗听到，遂跟随其后伺机偷盗。王春回到家中，妻子宁氏假意煲老鸭汤款待丈夫，趁机将其灌醉，与奸夫一道将丈夫勒毙后抛尸村外得冈边，挑生狗则趁此机会将王春包袱银两及宁氏首饰衣服全数盗走。第二天杨良来向王春借钱，此时王春尸首被人发现，宁氏遂嫁祸杨良，杨良屈打成招。挑生狗在场看不过，出来指证宁氏与何清得奸情即杀人经过，二人正在抵赖之际，王春苏醒，宁氏与何清皆撞头而死。对于何清何以总能遇难呈祥，作者的评论认为：